

“作为大学智库版,《“十三五”大战略》反映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关于“十三五”时期及2030远景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我们的自主选题,又是重点研究课题。它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旨在为国家发展规划提供高质量知识、创新性创意和主要目标参考,实现我们一贯秉承的“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

## 《“十三五”大战略》： 对未来发展的全新瞭望

□ 胡鞍钢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标志性的“一百年目标”。对此,党的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十八大(2012)围绕这一核心目标进行了三次总体设计、深刻阐述、全面部署,这是世界各大国发展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的确不同于那些实行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国家的制度安排,他们都会因各种选举、政党轮替、政府更迭、人事变动等不确定因素改变原有的国家发展目标和航线。

从新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每一届、每一代领导人,一方面要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为下一届、下一代打下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一届一届地接着做下去,一代一代地接着干下去,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始终不懈地追求中国梦想,我们才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按照“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国家决策的“外脑”,定位之一是“国家发展瞭望者”。为此,我们一直把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作为重要的专题,进行持续性研究、跟踪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自2002年起,我们作为中国大学智库持续研究2020年目标。现在看来,有的目标或指标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例如2013年的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人均GDP已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指标(HDI)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际竞争力已得到大幅度提高,进入世界500强企业、2000强企业数大幅度提高,等等。

《“十三五”大战略》是我们这个团队第四次专题研究2020年中国目标,它既是对以往研究的继承、集成和总结,又是在充分吸收党的十八大报告基础上的再研究、再创新

和再构想。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对2020年乃至对21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做出了总体设计、系统设计和顶层设计。其中,“四个全面”的核心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就需要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又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要采取哪些重大战略、重要举措?这正是这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作为大学智库版,《“十三五”大战略》反映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关于“十三五”时期及2030远景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我们的自主选题,又是重点研究课题。它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旨在为国家发展规划提供高质量知识、创新性创意和主要目标参考,实现我们一贯秉承的“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

这本书的主要创新、创意如下:

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科学发展”的内涵。一是遵循人类社会规律,必须社会主义发展;遵循经济规律,必须科学发展,创新发展;遵循社会规律,必须包容性发展、和谐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必须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尊重世界各国和不同文明,必须和平发展、共赢发展。

二是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就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对十几亿人民的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创造人的发展机会,提高人的发展能力,激发人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新要求。

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上层建筑

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

四是“全面统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五是“全面创新”驱动全面科学发展。就是从观念创新到战略创新,从体制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技术创新到市场创新,从人才创新到万众创新,从人民创新到国家创新,从地方创新到全国创新。全面科学发展,既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题,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主线。《“十三五”大战略》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目标,设计了可量化的主要目标及内容。在目标制定上,更加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方面,更加针对突出的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创新能力不强等),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强化资源环境指标的约束功能,更加突出引导市场、动员人民,激励社会的导向作用。

书中根据“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分别对“十三五”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缺政治建设),分篇分章深入分析和详细论述,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更具专业性研究参考。

《“十三五”大战略》研究的重点是“十三五”时期,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展望了2030年的中国。在前期研究(《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2011年)的基础上,这本书提出了2030年中国的愿景:2020年之后,中国进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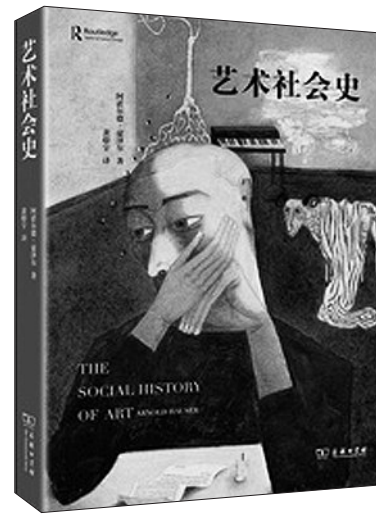


著译者言

## 《艺术社会史》： 堪称“孤本”的 艺术史经典

□ 黄燎宇

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是匈牙利裔艺术史和艺术社会学大家。他和卢卡奇、阿多诺、卡尔·曼海姆一样,属于20世纪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艺术社会史》已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囊括世界各大语种。欧、美大学的人文社科普遍把该书纳入参考书目。对于我们国内主要的艺术院校和艺术专业,豪泽尔也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由于包括其代表作《艺术社会史》在内的多数著作之前没有译成中文,对于国内学界,豪泽尔可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艺术社会史》  
【匈牙利】阿诺尔德·豪泽尔著  
黄燎宇译 商务印书馆

刚刚推出中文版的

《艺术社会史》(1950)是豪泽尔的成名作,也是其核心作品。这部十年磨一剑的著作与其日后撰写的几本著作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豪泽尔的第二部著作《艺术史的哲学》(1958)对《艺术社会史》的理论前提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自述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艺术社会史》那篇缺席的序言;他撰写第三部著作《风格主义:文艺复兴的危机与现代艺术的起源》(1964),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未能对“艺术成规的问题”进行充分阐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再次体验写作《艺术社会史》给他带来那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漂流而下”的美妙感觉;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社会学》(1974)则视为对《艺术社会史》的第二次理论提炼,写完该书后,年过八旬的豪泽尔深信自己是从事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对话》(1978)收录了对他的三篇采访和他的重要论文《卢卡奇的“第三道路”的各种变体》,其中既有他的理论思考,也有他的生平回忆,给《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宝贵材料。

豪泽尔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在已近花甲之年完成的《艺术社会史》却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文艺研究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带来刺激和震荡(德文版在1953年问世)。个中原因,首先在于《艺术社会史》的大气魄和宏阔视野。这部著作不仅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发展史(古代部分也提到了近东)进行了笔酣墨饱的勾勒和阐释,讨论了包括造型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戏剧、电影、综艺演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艺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系统地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对各种艺术现象进行跨学科的考察和分析,在哲学、美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分析、电影理论等十多个领域纵横捭阖,来回穿梭,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可以说,在豪泽尔之前,没有哪一本艺术史使用过这些学术长焦和学术广角镜头;在豪泽尔之后,这样的长焦和广角恐怕更是难得一见,因为我们的学术已逐渐步入后现代,步入后英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社会史》堪称“孤本”,甚至有空前绝后的意味。

另一方面,《艺术社会史》的先锋效应应归因于它的社会学取向。这一取向与它的时代氛围和接受环境形成了反差。二战结束后,受冷战氛围的影响,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东、西分野。一切政治化、社会化的艺术研究似乎都属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西方研究界所关注的则是形式问题、审美问题。新批评、文本批评等流派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当时的东、西方文艺研究最适合用韦勒克日后发明的那一对著名的概念来概括:前者为外部研究,后者为内部研究。在联邦德国,文艺研究急剧向内转,非政治化和审美享乐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对形形色色的去政治化倾向进行观察,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转折并非源于学科内部的发展规律,而是社会环境和研究者的个人政治策略使然:在刚刚过去的纳粹时代,德国文艺研究界几乎陷入集体性政治狂热,学术精英大面积地投入纳粹政府的怀抱。有了这段政治迷途,谁也不想再面对或者谈论政治。堪称战后德国文本批评之父的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Iser)在纳粹德国曾是政治急先锋,先后加入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纳粹倒台后,他远离政治,撰写出不朽的文艺学经典《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再版了20多次)。昔日的党卫军和纳粹党成员、狂热讴歌德军东征的作家和评论家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Hans Egon Holthusen),战后却因为一本远离政治的现代派文学研究文集《无家可归的人》(1951)而名声大噪。凡此种种,都可以为《艺术社会史》提供理想的注脚。

对于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西德学界毁誉参半。艺术社会学家玛塔·米伦多夫(Martha Mierendorff)和海因里希·托斯特(Heinrich Tost)对他表示怀疑和否定,但是,批判者和否定者并未占据上风,他们的声音最终还是被肯定和喝彩的声音淹没。肯定者中有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Christian Gneuss),他把《艺术社会史》比作“启示录”,称赞该书促使人们再度关注“宏观历史问题”;艺术史家埃克哈德·迈(Ekkehard Mai)把豪泽尔看作“人气最旺的跨学科研究大师”;文学史家尤尔根·沙尔夫施韦特(Jürgen Scharfschwerdt)认为豪泽尔的“很难精确化的艺术社会学构想”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后一次伟大的意义追寻和意义创造”。尤其重要的是,阿多诺和卢卡奇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也对豪泽尔表示了赞赏。前者跟霍克海默一道盛赞豪泽尔“有力地证明了用社会学分析艺术行之有效”,认为他“成功地对艺术史进行了总体阐述”;后者在一次电台对话节目中豪泽尔说:“如果我可以谈论您的作品,我就说,它的一个非凡功绩在于促使许多置身新实证主义浪潮之中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保持对现实关联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弱。”此外,在《艺术社会史》德文版问世的第二年即1954年,豪泽尔就获得了德国文学批评奖(该奖项的分量可以用豪泽尔前后的几位获奖者来衡量:1953年是海因里希·伯尔,1959年是阿多诺,1960年是君特·格拉斯,1966年是埃利阿斯·卡内蒂);1979年,即豪泽尔去世的第二年,曾对他表示不屑的西尔伯曼终于对他盖棺定论,把这本书收录到《艺术社会学经典》。

热点图书访谈

## 对人类发展的长距离思考

——访《21世纪政治经济学》作者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甚至还参加过北京的马拉松。所以我知道长距离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式。”在近日波兰大使馆举行的作者见面会上,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这样说。

科勒德克是一位具有独立思维的经济学家,还曾以政治家的身份,带领波兰经济转型并加入欧盟。他的新书《21世纪政治经济学》,结合他多年实践经验,以跨学科的视角对人类发展进行“长距离思考”。科勒德克在书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表了很多中肯的评价,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怎样看待“全球一体化”,是同意有人说的“全球化是从古罗马开始的历史进程”,还是认为历史上每一个大帝都有全球化的过程,只是规模不同?

科勒德克:全球化有不同的阶段,因而有不同的定义。从经济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市场进行融合,达到相互统一、相互依赖的自发过程。在全球化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点:自由发展、融合和相互依存。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货币、资本的不可流通,边境封锁等逆全球化现象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我觉得未来世界不会出现这些状况。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但这把双刃剑的好处要大于坏处。

记者:您在书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贫富差距问题,对此您有解决方案吗?

科勒德克:我认为贫富差距问题肯定有解决的办法。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或不增长,国家就需要从财政的角度来进行全社会的收入调节和再分配。从长期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是教育。大家接受了好的教育,找到好的工作,收入也不错,这样不但能养活自己,对于整个家庭也有帮助,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总的来说,我觉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知识储备,要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二是政治上解决问题的决心。

记者:您认为科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贫富差距、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战争等问题?

科勒德克:总的来讲,科技还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现存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些人说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能源、环境、人口问题等,这是很夸张的,技术会帮助我们缓解这些问题,而不是彻底解决。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科技进步,更多地与计算机、互联网有关,但我认为未来最重要的科技进步,会发生在材料工程、纳米技术、医学等领域。接下来在“大发明”,应该不会像汽车、电视、智能手机这样的东西,而是可以延长人类寿命的东西。

记者:您曾说过,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面,中国经济的高位运行比较符合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的“新常态”。您对此如何看待?

科勒德克: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超越GDP”的时代,所以在战略、政策方面,都应该符合“超越GDP”这个概念。除了GDP,我也提出了一些衡量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指数,比如融合幸福指数、融合福利指数等,它们包含社会、文化、医疗等很多的方面,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GDP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提到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中国的GDP增长大概能维持在7%左右。由于中国的发展过程可能会注意到自然资源保护、消除贫富差距、收入再分配以及避免高举债等问题,GDP增长的数字可能会变化。我认为在良好的宏观管理政策的前提下,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威胁论”?

科勒德克:我不觉得中国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历史上的西班牙、英国还有美国,在不同的时期称霸了全球。未来世界会向一个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会去称霸全

本报记者 张焱 实习生 刘亦凡



《21世纪政治经济学》  
【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著  
龙云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球,而将会成为全球的一部分。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不明智。